

创新驱动与创业协同:平台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双路径机制

孙树垒¹,朱 忆¹,葛世龙²

(1. 南京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 南京审计大学 工程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基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探究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赋能效应及内在机制。通过构建包含人口、经济、空间、社会与生态五个维度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选取2013—2023年中国(除港澳台)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平台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且呈现“中部>西部>东部”的梯度特征,凸显其在中等发达地区的倒U型增效潜力;科技创新与创业活跃度具有双重中介作用,其中科技创新贡献73.2%的间接效应,是核心驱动力;双重中介模型揭示两路径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创业活跃度虽发挥补充作用但传导效能较弱。进一步研究显示,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并非单一线性,还受到科技创新的负向调节。建议通过实施区域差异化战略、强化科技驱动的政策导向、构建“科技引领-创业协同”的发展生态,进一步释放平台经济的城乡融合潜能。

[关键词]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创业活跃度

[中图分类号]F49;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5)06-0101-11

一、引言

城乡融合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抓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城乡关系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空间体现,城乡融合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消除阶级对立和劳动分工异化的重要路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城乡关系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共生。这一过程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城乡发展规律的理论创新和时代化阐释。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是必由之路。从历史上看,城乡融合发展承载着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对现代化道路的持续探索与理想追求。从理论上看,城乡融合发展体现了对唯物主义城乡关系辩证法的科学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生动体现。从实践上看,城乡融合不仅关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涉及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人类文明角度看,城乡融合发展超越了简单的“城市化”或“逆城市化”单向逻辑,致力于构建一种人与自然、技术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形态。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在数字经济

[收稿日期]2025-07-15

[基金项目]江苏省乡村振兴软科学研究课题(25ASS050);南京财经大学校级科研课题(XKYC3202509)

[作者简介]孙树垒(1974—),男,山东淄博人,博士,南京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平台运营管理,邮箱:sunshulei@nufe.edu.cn;朱忆(2002—),女,安徽六安人,南京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平台经济;葛世龙(1980—),男,浙江天台人,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工程审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管理与审计。

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向乡村渗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搭起一座数字桥梁,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动能。然而,数字技术应用也呈现城市数字化转型加速,乡村数字化进程滞后的非均衡格局。平台经济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经济形态,其核心是通过互联网平台高效连接多方参与者,利用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优化资源配置。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之际,平台经济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载体,正重塑城乡要素流动的底层逻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13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8.2%,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67.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3.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42.8%;《数字乡村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农村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2.5万亿元,数字技术已渗透至农业生产、商贸流通和社会服务全链条。平台经济能否突破传统地理空间制约与旧有制度壁垒,并重构城乡要素流动与配置机制,这一变革性进程引发了对新型城乡关系的学术思考。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受到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1]。既有研究围绕城乡融合的理论内涵^[2-3]、评价测度^[4-7]、影响因素^[8]、耦合发展^[9]及驱动机制^[10]等展开了多维度探讨,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城乡融合的评价体系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构建了多维度的测度框架。例如,周佳宁等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揭示了中国城乡融合的时空分异特征^[4];孙涛等提出应从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四个维度建立城乡融合的评估框架^[5];孙虹从人口、经济、社会和生态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和障碍因素^[6];张天帷和高帆则基于“基础-过程-绩效”的逻辑框架,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更系统性的度量^[7]。这些研究为本文构建包含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和生态五个维度的城乡融合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城乡融合的驱动机制研究中,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日益凸显。大量文献证实,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打破信息壁垒、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融合等途径显著推动城乡融合发展^[11-12]。此外,数字金融、数字物流等数字经济的具体产业形态,也被证实对城乡融合具有积极影响^[13-14]。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数字经济视为一个整体,对其内部不同组织形态的差异化影响机制探讨不足,尤其缺乏对平台经济这一典型数字经济形态的深入剖析。

平台经济作为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多边市场连接的新型经济形态,已在多个领域展现深刻影响力。研究表明,平台经济能够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15]、有效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16]、提高就业质量并助力共同富裕进程^[17]。尤其在农村领域,电子商务促进农村发展^[18],数字化应用持续缓解城乡差距^[19],数字技术增强农业和乡村竞争力^[20],数字经济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21],而且平台经济显著提升了农村创业活跃度^[22]。这些研究虽暗示了平台经济可能通过激发创业、促进创新等机制影响城乡关系,却未直接回应平台经济如何系统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核心问题。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独立形态,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财政自给度下的梯度赋能效应,揭示其中部地区的倒U型增效特征;二是同步考察并系统验证科技创新与创业活跃度的双重中介作用,揭示两者在传导过程中的贡献差异与竞争关系;三是引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识别科技创新在平台经济与城乡融合关系中的复杂调节效应,深化对平台经济赋能边界条件的理解。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平台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平台经济通过消除信息壁垒、延伸产业链条,成为驱动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关键引擎。一方面,平台经济能够打破信息壁垒,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平台经济依托多边网络,为城乡间信息的获取、传播与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构建起城乡间高效的信息传播与匹配机制。这种信息畅通不仅使

农民能够及时获取就业与投资机会,更激活了土地要素市场。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宅基地出租等交易均依托平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土地是乡村的核心资源,土地的资源化、资本化是乡村振兴的加速器^[23]。已有研究证实,农村宅基地改革^[24]、“三块地”改革^[25]、农地市场化^[26]等能够显著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平台经济对城乡信息不对称的根本性破解,奠定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基石。另一方面,平台经济通过推动产业协同,重构城乡价值链格局。相较于实体市场,平台经济极大缩短了农产品进入流通环节的时间,有效降低了供需匹配的搜寻成本,使农产品得以触达更广阔的消费市场。这种供需的高效衔接不仅直接提升农业生产效能,更能通过实时市场数据为生产者提供精准生产指引,进而推动农产品品质优化与品牌建设。同时,在平台经济的协同效应下,物流、深加工等配套产业加速整合,进一步深化了城乡产业协作。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乡村旅游服务业等产业链条由此向县域下沉延伸,在乡村层面实现了供应链升级与价值链重构。田野等指出,城乡市场有效对接会促进乡村产业融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21]。亦有研究证实了农林产业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27]。要素流动扩大了农民经营性收入、投资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而产业协同则提升了农业附加值与三产融合收益,这种双轮驱动模式能够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提供底层动能。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H1:平台经济可以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在平台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进程中,兼具转换器与放大器的双重功能。已有研究发现平台经济能够显著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16],而创新则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28]。首先,平台经济通过整合城市科研机构的研究资源与乡村应用场景的现实需求,形成“需求引致—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闭环创新链。江苏尚明甸村通过开放平台建设院士工作站和科创之家,打造乡野硅谷^[29];浙江安吉余村的“全球合伙人”计划通过开放平台吸引全球青年人才,形成了创新网络^[30]。这种开放式创新网络打破了城乡创新系统的传统割裂,使乡村通过平台接口嵌入全球创新体系。其次,平台驱动的数字技术具有很强的空间穿透性。一方面,依托低成本的数字基础设施,解决了乡村数字技术应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障碍,显著加速技术扩散效率;另一方面,基于跨地域知识共享社区,推动城市知识资本向乡村梯度转移,不仅实现智能农业设备等显性技术的应用,更促进组织模式、管理经验等隐性知识的传播。科技创新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范斯义和刘伟从理论上全面剖析了科技创新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31],刘健等则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32],发现科技创新水平增加1个单位,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水平提升0.372。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科技创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3]。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H2:科技创新是平台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创业的本质根植于对生产要素再组织与价值创造模式的革新。不少学者认为激发大众创业是数字经济释放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34-35],而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组织形态的平台经济对农村创业具有显著提升作用^[22]。从要素配置视角看,平台经济通过降低数字化创业门槛,破解传统创业的资本壁垒和地域约束,使乡村劳动力、特色农产品、在地文化等沉睡资源得以转化为市场化资本。这种转化不仅释放了乡村内生发展动能,更通过创业主体的多元参与重塑了城乡产业链分工形态——城市的技术资本与乡村的要素禀赋在平台生态中形成新的组合方式,催生基于地域特色的微型产业链与柔性供应链。从空间互动维度分析,创业活动天然具有连接供需两端的网络效应,而平台架构放大了这种连接的广度与深度。乡村创业者通过平台接口接入城市消费市场,城市创新要素通过创业载体下沉至乡村应用场景,形成双向渗透的价值循环。这种循环不仅促进人才、资金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有机流动,更通过创业试错过程中的知识溢出与技术迭代,持续优化城乡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尤其关键的是,创业行为本身即城乡制度壁垒的“破壁器”,倒逼基础设施联通、规则标准互认与公共服务延伸,在微观层面推动城乡制度环境趋同。如,农民创业资金需求倒逼金融机构改革;为提高返乡创业服务质量,河南漯河积极构建

“一体两翼八轮驱动”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36]。因此,创业成为平台经济推动城乡融合不可或缺的传导枢纽。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H3:创业活跃度提升是平台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1. 基准模型

为探讨平台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加入影响城乡融合的相关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如下:

$$Uri_{it} = \alpha_0 + \alpha_1 Pla_{it} + \alpha_2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1)

其中,下标 i 代表省份、 t 代表年份; Uri_{it} 为 i 省 t 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Pla_{it} 为 i 省 t 年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 X_{it} 为系列控制变量; α_0 为截距项, α_1 和 α_2 分别表示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 μ_i 为省份固定效应; η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干扰项。

2. 机制检验模型

理论上,创新与创业在平台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重要中介作用,为实证检验这一双重中介作用,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如下中介机制检验模型:

$$M_{it} = \beta_0 + \beta_1 Pla_{it} + \beta_2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2)

$$Uri_{it} = \gamma_0 + \gamma_1 Pla_{it} + \gamma_2 M_{it} + \gamma_3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3)

其中, M_{it} 为中介变量, γ_1 表征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 β_1 、 γ_2 表征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效应。模型(1)中 α_1 表征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效应。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Uri)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过程,核心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资源的双向流动,实现深层次、宽领域、多元化、全方位的融合,具体包括人口融合、经济融合、空间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五个方面。根据周佳宁等的研究^[4],基于城乡融合的内涵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构建包含人口、空间、经济、社会 and 生态 5 个维度共 16 个指标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蕴含表征城乡差距的对比类指

表 1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或说明	类型	属性
人口融合	人口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	状态	正向
	人口密度	总人口/土地总面积	动力	正向
	人口死亡率	死亡人数/总人口	状态	负向
空间融合	土地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	状态	正向
	人均汽车拥有量	私人汽车数量/总人口	动力	正向
	交通网密度	公路与铁路运营总里程/土地总面积	动力	正向
经济融合	人均 GDP	GDP/总人口	动力	正向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对比	负向
	城乡居民消费比	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对比	负向
生态融合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建成区面积	状态	正向
	人均公园面积	公园绿地面积/总人口	动力	正向
	生活垃圾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	状态	正向
社会融合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从业人员数	状态	负向
	养老保险覆盖率	养老保险人数/总人口数	状态	正向
	城乡人均医疗比	城镇人均医疗支出/农村人均医疗支出	对比	负向
	教育投入水平	教育经费支出/一般预算支出	状态	正向

标、推进城乡协调并进的动力类指标和反映城乡一体化的状态类指标,具体见表 1,运用熵权法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2. 解释变量

学界目前尚未有对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度量的统一做法,既有构建平台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17],也有使用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量^[15]或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37]单一指标的做法。本研究综合

考虑这两种方法。首先,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将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投入、运营和产出3个一级指标13个具体指标(如表2所示),并应用熵权法测算各地区历年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6个控制变量,分别是:政府干预程度(*Gov*),以地方政府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水平(*Fdi*),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以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状况(*Ind*),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投入(*Edu*),以教育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居民消费水平(*Cpi*),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

4. 中介变量

本研究中介变量分别为科技创新与创业活跃度。科技创新水平以地区专利申请数量(*Sci*,单位:万件)衡量;创业活跃度以新增注册企业数量(*Ent*,单位:万家)衡量。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①

本文以2013—2023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港澳台)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EPS数据平台、爱企查平台和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查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无法补充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或线性回归法进行插补。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Uri*)的均值为27.159,标准差为13.802,波动范围从5.477到77.545,表明各省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Pla*)的均值为12.887,标准差为11.240,反映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在省份间的不平衡性。

四、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在控制相关变量后,采用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表3的列(1)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优度良好,平台经济指标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平台经济能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假设1成立。由平台经济系数可知,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单位,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增长0.193。结合样本均值(*Pla* = 12.887, *Uri* = 27.159),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增长11%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上升约1%,显示出平台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的赋能价值。

在控制变量层面,政府干预程度(*Gov*)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扩张可能挤占市场化资源配置空间,抑制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金融发展水平(*Fin*)同样呈现负向效应,反映出现有金融资源向城市倾斜的结构性失衡,农村金融可得性不足会加剧城乡鸿沟;产业结构高级化(*Ind*)则显著促进城乡融合,说明第三产业占比提升通过服务业渗透能够加速城乡产业联结。

(二) 稳健性检验

首先,尽管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进一步向各行各业渗透,其内涵已从单纯的在线交易扩展到更复杂的数字生态,但电子商务始终是最活跃的应用场景之一。电子商务交易活动

表2 平台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具体指标	属性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	投入水平	互联网接入端口	正向
		光缆线路总长度	正向
		域名数	正向
		移动电话基站数量	正向
		IPv4 地址数	正向
	运营水平	电子商务销售额	正向
		电子商务采购额	正向
		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	正向
		快递营业网点	正向
		人均互联网用户快递件数	正向
	产出水平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正向
		人均软件信息行业总收入	正向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就业人员	正向

①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的企业数量能够从企业层面度量当地平台经济的发展状况,而电子商务交易额则从规模上衡量了平台经济。因此,结合本研究的特点,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11-12],分别使用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Tra*,单位:万亿元)和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量(*Num*,单位:万家)作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式(1)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的列(2)和列(3),可以看出,无论是以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还是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量作为平台经济的代理变量时,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其次,更换基准回归中城乡融合与平台经济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应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各自得分,再次对式(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的列(4),此时,回归系数为0.037,通过5%显著性检验。最后,为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对表3中所有变量进行1%和99%的双侧缩尾处理,回归结果见表3的列(5),回归系数为0.200,依然显著为正。综合来看,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良好稳健性。

表3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1) 基准回归	(2) 替换解释变量	(3) 替换解释变量	(4) 因子分析法	(5) 缩尾处理
<i>Pla</i>	0.193 *** (0.016)			0.037 ** (0.016)	0.200 *** (0.017)
<i>Tra</i>		1.168 *** (0.097)			
<i>Num</i>			4.384 *** (0.336)		
<i>Gov</i>	-8.595 *** (1.878)	-9.456 *** (1.848)	-10.461 *** (1.789)	-0.266 * (0.138)	-8.949 *** (1.935)
<i>Fdi</i>	-0.057 (0.052)	-0.066 (0.051)	-0.078 (0.049)	-0.010 *** (0.004)	-0.129 (0.082)
<i>Fin</i>	-18.978 *** (6.698)	-21.161 *** (6.652)	-14.427 ** (6.430)	0.902 * (0.495)	-21.230 *** (6.618)
<i>Ind</i>	1.189 *** (0.403)	1.069 *** (0.401)	1.979 *** (0.370)	-0.026 (0.029)	1.358 *** (0.410)
<i>Edu</i>	8.765 (31.440)	-22.275 (31.311)	11.584 (30.293)	1.415 (2.334)	-16.408 (35.984)
<i>Cpi</i>	-0.213 (0.142)	-0.194 (0.141)	-0.177 (0.137)	-0.039 *** (0.011)	-0.232 (0.142)
常数项	44.670 *** (15.277)	46.268 *** (15.142)	39.806 *** (14.679)	3.600 *** (1.138)	48.809 *** (15.234)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41	341	341	341	341
F统计量	1658	1690	1786	498.4	1711
调整 R ²	0.996	0.996	0.996	0.986	0.996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三) 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的缓解是经济学研究必须优先考虑的关键环节。从本文关注的主题出发,考虑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平台经济发展推动城乡融合,而城乡融合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由于可能存在潜在的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识别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影响的净效应。

平台经济作为诞生于互联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经济形态,以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纵观人类信息通信发展史,从语言、烽火起步,经电报电话实现远程联络,再由无线电拓展到无线传输,到由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最终打破时空壁垒,不断迈向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我国互联网时代起始于1994年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在此之前,人们的信息沟通方式主要是通过邮政系统。互联网的早期布局与邮政物流通道有非常高的重合性,邮局布局也通过影响互联网的使用技术与习惯养成影响到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基于此,不少学者选取固定电话数量或邮局数量作为地区互联网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38]。本文将平台经济的滞后一期分别与1984年邮政网点密度或每平方公里的邮路长度构建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分析表明,该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约束:首先,1984年的邮政数据是历史数据,在时间上早于研究期,满足时间上的外生性;其次,传统邮政与支撑平台经济的现代数字通信技术之间存在技术代际差异,传统邮政的核心功能已被互联网替代,其自身不具备影响现代城乡融合的能力;最后,邮政系统是互联网普及前的主要通信方式,与早期互联网基础设施布局有高度空间相关性,历史邮政数据与当代的城乡融合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仅通过影响早期互联网基础设施布局间接影响平台经济的历史发展基础。基于历史性、技术代差和空间路径依赖的特征,可以合理地认为,选定的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约束条件:它们仅通过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水平来间接影响当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而没有其他直接或间接的传导路径。

表4的列(1)和列(2)展示了采用平台经济滞后一期与邮政网点数量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时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列(3)和列(4)展示了采用平台经济滞后一期与邮路长度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时的内生性检验结果。LM统计量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设,Wald F统计量也拒绝了弱工具变量设定,表明所选工具变量合理有效。第一阶段回归分析中,工具变量与平台经济显著正相关,证实路径依赖效应;第二阶段回归分析中,平台经济系数仍显著为正,且升至0.256和0.257,表明未考虑内生性时基准模型存在低估偏误,反向因果导致平台经济真实贡献被掩盖,但综合来看,在充分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基准回归模型结论依然稳健可靠。

(四) 异质性检验

1. 区域异质性

由于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文化观念等方面差异较大,城乡融合发展的配套政策、平台经济的扶持力度及监管方式也存在明显不同。因此,按照地域分布分别从东中西部角度出发,进行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区域分组回归,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平台经济均表现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但影响效应大小存在差异性,平台经济对中部地区城乡融合的促进效应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这一“中部>西部>东部”的梯度差异性,说明平台经济在城乡融合中的作用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在中等发达水平地区效果最显著,其原因可能源于政策与产业两个方面。在政策方面,中部地区是国家战略试验区,政策敏感度高,西部虽有政策倾斜但设施配套不足,东部市场成熟反而政策空间小;在产业方面,中部工业基础好,平台嫁接实体经济的接口多,西部受限于基础设施和人才,而东部产业升级门槛高。最后是城乡结构本身差异,东部城乡界限模糊效应反而弱,西部城乡落差大但转化困难,中部处于最佳发力区间。

2. 财政自给度

现有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影响^[35]。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地方财政保障能力密切相关,如果地方政府有较高的财政自给度,就有积极性支持“三农”发展。本研究将地方政府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Gov,但并未完全刻画不同财政自给度对城乡融合带来的影响。因此,

计算研究期前一年(2012年)各省份的财政自给度,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将各省份分为三组,第一组财政能力相对较强,财政自给度大于50%;第二组财政紧张,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自给度处于[30%,50%];第三组财政困难,高度依赖转移支付,财政自给度小于30%。依据财政自给度分组后,检验平台经济在不同财政保障能力下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效果,结果见表5。

根据表5财政自给度分组回归结果,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差异。财政自给度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1) <i>Pla</i>	(2) <i>Uri</i>	(3) <i>Pla</i>	(4) <i>Uri</i>
<i>Pla</i>		0.256 *** (0.025)		0.257 *** (0.028)
工具变量	0.213 *** (0.013)		0.002 ***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0	310	310	310
LM统计量	259.416		164.376	
Wald F统计量	138.543 ***		107.308 ***	

表5 异质性检验结果

	区域			财政自给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0.5	0.3~0.5	<0.3
<i>Pla</i>	0.088 *** (0.027)	0.648 *** (0.073)	0.156 *** (0.039)	0.104 *** (0.026)	0.257 *** (0.038)	-0.004 (0.141)
常数项	74.963 ** (32.557)	78.546 ** (31.633)	37.727 ** (14.704)	64.157 * (33.544)	52.690 *** (15.059)	84.204 ** (29.1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1	88	132	132	176	33
F统计量	837.6	420.1	427.6	832.8	320.7	117.3
调整R ²	0.995	0.991	0.989	0.994	0.983	0.986

中等(30%~50%)的地区促进效应最强,高自给度(>50%)地区次之,而低自给度地区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地方财政保障能力是平台经济赋能成效的重要约束,中等财政能力地区既能支撑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又存在充足的城乡融合提升空间,故政策效果最优;而财政高度依赖转移支付的地区,因配套资源不足难以有效转化平台经济红利。

(五) 中介检验

为探索科技创新与创业活跃度是否在平台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分别以科技创新和创业活跃度作为中介变量,使用机制检验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列(1)显示平台经济对科技创新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列(2)显示科技创新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证明了科技创新在平台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假设2成立;列(3)显示平台经济显著激发了创业活跃度,列(4)显示创业活跃度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因此,证明了创业活跃度在平台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具有显著中介作用,假设3成立。为防止因单独考察某一中介路径而忽略其他路径导致的估计偏误,在式(3)中同时纳入双重中介,回归结果如表6的列(5)所示,可以发现,创新与创业的双重中介作用依然显著。

表7 给出了使用自助法(Bootstrap)

抽样1000次得出的单一中介机制和双重中介机制的效应分解及其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表7的多层次机制分解结果深刻揭示了平台经济驱动城乡融合的内在逻辑。在单一中介路径分析中,科技创新(Sci)展现突出的传导效能,其间接效应(0.088)占总效应的45.6%;且其置信区间[0.056,0.119]稳健远离零点,表明Sci作为核心机制的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

与之相对,创业活跃度(Ent)的间接效应(0.030)相对较小,仅占总效应的15.5%;更为关键的是,Ent路径的置信区间下限(0.010)非常接近零点,表明该路径效应相对较弱,平台经济资源在这条路径上可能存在较大的传导损耗或不稳定性。

当纳入Sci和Ent双重中介模型后,Sci的间接效应降至0.058,降幅达34.1%,Ent也衰减至0.021,降幅达29.3%;值得注意的是,Ent的置信区间变为[0.002,0.041],几乎覆盖零点,显示其单独贡献的统计可靠性在双重机制分析中较弱。这种显著的共同衰减有力地揭示了在单一路径分析中被掩盖的中介变量竞争关系。Sci与Ent存在部分共用的资源池(如政府补贴和人才流入),导致在孤立评估时各自贡献被高估。

进一步分析直接效应发现,双重中介模型中的直接效应(0.113)显著高于Sci单一模型(0.105)而低于Ent单一模型(0.163)。这表明在创业活跃度(Ent)单一中介路径中,存在更多的传导损耗(损失的直接效应更多);而科技创新(Sci)路径可能通过技术外溢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这种效率损失。

表6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1) <i>Sci</i>	(2) <i>Uri</i>	(3) <i>Ent</i>	(4) <i>Uri</i>	(5) <i>Uri</i>
<i>Pla</i>	1.134 *** (0.071)	0.105 *** (0.021)	2.265 *** (0.431)	0.163 *** (0.016)	0.113 *** (0.021)
<i>Sci</i>		0.077 *** (0.013)			0.051 *** (0.014)
<i>Ent</i>				0.013 *** (0.002)	0.009 *** (0.002)
常数项	-0.956 (66.452)	44.744 *** (14.408)	-107.971 (400.818)	46.109 *** (14.338)	45.736 *** (14.0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41	341	341	341	341
F统计量	66.44	1826	39.82	1844	1885
调整R ²	0.900	0.996	0.843	0.996	0.996

表7 效应分解

中介机制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i>Pla</i> → <i>Sci</i> → <i>Uri</i>	0.105 *** [0.039,0.171]	0.088 *** [0.056,0.119]	0.193 *** [0.141,0.244]
<i>Pla</i> → <i>Ent</i> → <i>Uri</i>	0.163 *** [0.114,0.211]	0.030 *** [0.010,0.051]	0.193 *** [0.142,0.244]
<i>Pla</i> → $\left\{ \begin{matrix} Sci \\ Ent \end{matrix} \right\}$ → <i>Uri</i>	0.113 *** [0.055,0.171]	0.058 *** [0.025,0.091] 0.021 ** [0.002,0.041]	0.193 *** [0.141,0.244]

注:中括号内为95%置信区间。

无论采用何种中介模型,总效应均稳定保持在 0.193,印证了平台经济赋能城乡融合效应的客观存在。在双重中介模型中,总间接效应(0.058 + 0.021 = 0.079)的 73.2% 来源于 *Sci*;而 *Ent* 仅贡献 26.7% (0.021),且效果不够稳健(CI 下限为 0.002)。这一效应分解清晰地表明,平台经济的赋能效应本质上由科技创新的核心转化力所驱动,创业活跃度扮演补充性角色。

(六) 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为全面揭示双路径的复杂关系,进一步考察有调节的中介机制模型,结果见表 8。由表 8 可知,三种情形下,平台经济始终保持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显著正向直接效应。

当单独引入平台经济与科技创新的交互项(*Pla* × *Sci*)时,发现平台经济与科技创新的交互项负相关且显著,表明科技创新负向调节了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的直接影响,意味着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的直接促进效应会减弱。可能的经济学原因为,在科技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平台经济带来的技术普及和效率提升(如电商下乡、数字政务)的边际效应非常大,能直接快速地推动城乡融合;而在科技创新水平已经很高的地区,平台经济的基础设施和模式已经相对成熟和饱和,其直接推动城乡融合的边际效应递减。此时,城乡融合的进一步提升更依赖于其他复杂因素(如制度深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等),而非单纯的平台规模扩张。当同时纳入平台经济与科技创新的交互项(*Pla* × *Sci*)以及平台经济与创业活跃度的交互项(*Pla* × *Ent*)时,即表 8 中的列(3),*Pla* × *Sci* 的系数依然为负且显著,与列(1)结论完全一致,证明了科技创新负向调节作用的稳健性。

当单独引入平台经济与创业活跃度的交互项(*Pla* × *Ent*)时,发现该交互项不显著,说明创业活跃度并未显著调节平台经济与城乡融合之间的直接关系,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随着创业活动的高低而发生系统性、统计上的显著变化。当同时纳入两个交互项时,创业活跃度的主效应变得不显著,其交互项变为正相关且较为显著,但系数值较小。这表明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相对较弱且不稳定,其经济意义远小于统计意义,该调节效应可以忽略。

总体来看,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受到其自身发展所依赖的科技环境的深刻影响。

五、结论性评述

本研究聚焦于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赋能效应,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系统探讨了其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打破信息壁垒、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协同与价值链延伸,平台经济有效提升了城乡融合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平台经济的赋能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中部 > 西部 > 东部”的梯度特征,表明其在中等发达地区具有最强的边际效应,呈现倒 U 型增效特征。财政自给能力中等地区的效果最佳,反映出地方财政保障能力是平台经济发挥作用的重要约束条件。(3)科技创新与创业活跃度在平台经济推动城乡融合过程中扮演了双重中介角色。其中,科技创新的中介贡献占总间接效应的 73.2%,是核心驱动路径;创业活跃度虽具有统计显著性,但传导效率较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资源竞争关系。(4)平台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并非简单线性,还受到科技创新的负向调节。随着科技创新水平提高,平台经济的直接促进效应呈边际递减趋势,表明在科技成熟地区需更多依赖制度深化与结构优化推动融合;创业活跃度则未表现出稳定的调节效应。

表 8 有调节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1) <i>Uri</i>	(2) <i>Uri</i>	(3) <i>Uri</i>
<i>Pla</i>	0.147 *** (0.020)	0.156 *** (0.019)	0.158 *** (0.020)
<i>Sci</i>	0.203 *** (0.021)		0.178 *** (0.023)
<i>Pla</i> × <i>Sci</i>	-0.003 *** (0.000)		-0.004 *** (0.001)
<i>Ent</i>		0.012 *** (0.003)	0.003 (0.003)
<i>Pla</i> × <i>Ent</i>		0.000 (0.000)	0.000 ** (0.000)
常数项	52.006 *** (13.400)	49.248 *** (14.374)	55.281 *** (13.1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41	341	341
F 统计量	2082	1804	2103
调整 R ²	0.997	0.996	0.997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实施区域差异化战略,重点培育中部地区成为平台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示范高地。研究表明,平台经济的赋能效能呈现“中部最高、西部次之、东部较弱”的梯度特征,表明中部地区正处于政策和产业协同的最佳作用区间。建议优先在中部省份设立国家级融合发展试验区,集成土地、财税、数据等差异化政策工具,引导平台企业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及数字农业基地落地,充分释放其处于倒U型曲线顶部的增效潜力,为全国输出可复制的区域实践范式。第二,强化科技驱动的政策导向,引导资源向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平台主体集聚。鉴于科技创新贡献了平台经济间接效应的73.2%,是城乡融合的核心驱动力,应确立以技术赋能为核心的政策评价与支持体系。建议各级政府设立科技赋能专项,优先支持那些能够提供智慧农业解决方案、数字溯源系统等关键技术的平台企业,从考核交易规模转向评估其技术溢出效应与成果转化,从而推动资本与人才向高赋能效率的科技路径集中。第三,构建“创新-创业”协同机制,优化双路径下的资源配置效率。鉴于科技创新与创业活跃度两路径间存在资源竞争关系,需通过制度设计避免二者因资源竞争而产生的分流与内耗。应鼓励科技平台向乡村创业者开放数据接口、低代码工具和共享算力,降低创业的技术门槛;同时引导创业主体接入平台创新生态,推动形成“技术供给-场景应用-市场拓展”的闭环,促进创新与创业由资源竞争转向能力互补,形成以技术引领创业、以创业反哺创新的城乡融合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王伟,姜涛,蒋武. 城乡融合视阈下乡村振兴研究热点及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 经济界,2023(4):86-96.
- [2] 许彩玲,李建建. 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考[J]. 经济学家,2019(1):96-103.
- [3] 周德,戚佳玲,钟文钰. 城乡融合评价研究综述:内涵辨识、理论认知与体系重构[J]. 自然资源学报,2021(10):2634-2651.
- [4] 周佳宁,秦富仓,刘佳,等. 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9):166-176.
- [5] 孙涛,梁翔茹,王硕. 城乡融合指标体系构建的四个维度和四个向度[J]. 计量经济学报,2024(6):1649-1670.
- [6] 孙虹.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25(5):115-120.
- [7] 张天帷,高帆. 基于“基础-过程-绩效”框架的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测度研究[J]. 经济纵横,2024(8):82-93.
- [8] Chen C, LeGates R, Fang C. From coordinated to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s megacity regions[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9,41(2):150-169.
- [9] 张世贵.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的价值意蕴、生成逻辑及行动框架[J]. 中州学刊,2025(1):65-73.
- [10] 辛金国,张虹虹. 绿色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基于 PVAR 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J]. 调研世界,2023(2):3-12.
- [11] 孟维福,刘婧涵,杨天宜.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经济问题,2024(11):30-39.
- [12] 周清香,李仙娥.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24(8):104-109.
- [13] 庞洪伟,杨瑶,巩艳红. 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J]. 统计与决策,2024(19):24-30.
- [14] 薛阳,贾慧,冯银虎. 数字物流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24(4):62-77.
- [15] 孙永强,石尉艺,刘雅欣. 平台经济能否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 [J]. 上海经济研究,2023(10):51-62.
- [16] 姜琪,李吉志,姜常梅. 平台经济能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吗? [J]. 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2):56-67.
- [17] 车放. 平台经济、就业质量与共同富裕[J]. 统计与决策,2024(18):34-39.
- [18] Lin G, Xie X, Lv Z. Taobao practices, everyday life and emerging hybrid ru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47(B):514-523.
- [19] Fu H, Guan J, Wang R, et al. How does digitalization affect the urban-rural disparity at different disparity levels: A Bayesian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4,78(3):102633.
- [20] Klerkx L, Jakku E, Labarthe P. A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 on digital agriculture, smart farming and agriculture 4.0: New contributions and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J]. NJAS-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 2019, 91(4):100315.
- [21] 田野,叶依婷,黄进,等.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效应[J]. 农业经济问题,2022(10):84-96.
- [22] 程聪慧,刘昱呈. 平台经济发展与农村创业活跃度[J]. 科学学研究,2024(10):2138-2149.
- [23] 熊易寒. 城乡融合、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J]. 人民论坛,2022(5):32-35.

- [24] 韦彩玲, 童心. 宅基地产权显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来自西南地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经验证据[J]. 开发研究, 2025(2): 30-42.
- [25] 张聪, 龙花楼. 农村“三块地”改革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5): 121-133.
- [26] 周佳宁, 曹铁毅, 邹伟. 农地市场化、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累积循环效应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3): 31-38.
- [27] 段佳龙, 邓一平, 熊曦, 等. 农林产业发展对长株潭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24(11): 195-204.
- [28] 沈坤荣, 金童谣, 樊士德. 以数字技术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实证研究[J]. 宏观质量研究, 2024(3): 17-31.
- [29] 农村工作通讯调研组. 潮涌姑苏——江苏省苏州市深化农村改革的实践探索[J]. 农村工作通讯, 2024(13): 19-23.
- [30] 代玉启, 于小淳. “三乡人”: 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叙事及其文化逻辑[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1-9.
- [31] 范斯义, 刘伟. 科技创新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及实践路径[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13): 40-47.
- [32] 刘健, 苏洋, 李成民, 等. 科技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与实证分析——基于创新扩散视角[J]. 中国农机化学报, 2024(11): 342-352.
- [33] 于金宽, 魏凤.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J]. 华东经济管理, 2024(12): 86-96.
- [34] 赵涛, 张智, 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0(10): 65-76.
- [35] 刘翠花.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2): 112-125.
- [36] 回眸 2024 中国就业十件大事地方就业创新事件揭晓[J]. 中国就业, 2025(02): 4-14.
- [37] 李敏, 吴丽兰, 吴晓霜. 平台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10): 62-69.
- [38] 黄群慧, 余泳泽, 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 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8): 5-23.

[责任编辑: 苗竹青]

Innovation-Driven and Entrepreneurship-Synergized: Dual Pathways of Platform Economy Empower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UN Shulei¹, ZHU Yi¹, GE Shilong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Engineering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nabling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platform economy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y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ncompassing five dimensions, population, economy, space, society, and ecology, and employing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23 for Chinese 31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the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latform economy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latform econom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hibiting a “central > western > eastern” regional gradient that highlights its inverted U-shaped enhancement potential in moderately developed areas. Bo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demonstrate dual mediating roles, with innovation contributing 73.2% of the indirect effects and serving as the core driver. The dual-mediator model further uncovers resourc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pathways, indicating that while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 complementary role, its transmission efficacy remains limited. Further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not a simple linear relationship but is also negatively moderat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implementing region-specific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the technology-driven policy orientation, and fostering a technology-driven and entrepreneurship-synergized development ecosystem, to further unleash the platform economy’s potential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platform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5 年总目次

审计学科发展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审计学科功能定位与创新发展	孙甲奎(1.01)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双三螺旋型审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王海滨,刘儒昞(1.12)
中国审计高等教育的适应与超越	黄雷,孔楠,周方舒(2.01)
数字平台算法审计:现实理据、客观挑战与关键进路	贺勇,李佳蔚,刘筱祎(2.10)
关于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审计学一级学科的构想	董必荣(3.01)
国家审计职业化: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李明辉(3.10)
数字化视角下审计学科的空间信息价值创造研究	吴凯,周文,陈永泰(4.01)
清末民初查账人考论	方宝璋,彭岚(5.01)
科学规范审计的解构、归因与效应	
——基于 DeepSeek 应用	徐京平,陈思奇(5.13)
谢觉哉审计监督思想:形成、内涵及启示	谢冬慧(6.01)
高校内部审计智能化转型:框架建构、实践机制与挑战应对	户晓雅(6.11)

审 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审计监督目的:变迁与启示	张枫波(1.21)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祝遵宏,蔡政煜,方毅峰(1.32)
政府投资基金审计的行为策略与声誉激励效应	
——基于四方演化博弈分析	后小仙,鲜崇琰(2.21)
ESG 评级分歧能影响审计师决策吗?	
——基于审计意见视角的证据	刘耀娜,张焰朝(2.35)
政府环境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	卢锐,唐凯,陈诗婷(3.25)
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与审计收费水平	
——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的经验证据	乔贵涛,张硕(3.37)
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与区域绿色创新	李晓慧,宝露日(4.12)
国家审计何以促进城市碳减排?	陈春林,何信刚(4.22)
高质量审计师的团队溢出效应:来自审计收费的证据	刘圻,周志远,钟梅花(4.34)
注册制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机构投资者意见分歧吗?	
——基于科创板 IPO 公司的经验证据	张子健,李 佳,谭 雪(4.44)
以“审”促“新”:研究型审计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向度与进路	
.....	王扩建,宗 毅(5.24)
哪些是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的关键因素?	
——基于影响强度的再实证	易 玄,袁翊豪,侯鑫涛(5.33)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与审计定价	
——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文 雯,孙亚婕,牛煜皓(5.44)
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与民生性财政支出	李璐璐,上官泽明(6.21)
共享审计师能够抑制企业杠杆操纵行为吗?	张子余,贾雨轩(6.33)
ESG 同群效应与审计收费	唐凯桃,张思刚,龙 阳(6.44)

企业管理

非控股股东治理对“走出去”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李玉娟,任雪姣,郑宇轩(1.43)
数字化赋能女性创业的激发机制	
——基于多案例的探索性研究	高秀娟,王 红(1.54)

高管媒体背景有助于提升企业 ESG 信息披露质量吗?	常莹莹,陈秀雯,林向荣(2.45)
言浮于行,实以治之:高管环保背景与企业“漂绿”	牛 枫,罗智超,邱保印(2.55)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风险缓释效应	
——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经验证据	徐玉德,程 东,刘晓颖(3.48)
污染物排放考核能驱动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的量质齐升吗?	
——来自节能环保类央企环保投资与绿色创新的证据	张兴亮,赵浩秀(3.59)
女性高管的 ESG 责任取向:“漂绿”还是“真绿”?	吕秀梅,罗 丹(4.55)
短贷长投、代理成本与重资产企业投资效率	赵玉珍,付美琪(4.67)
客户稳定性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余怒涛,李奕蓉,杨张萌(5.55)
政务服务一体化如何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创新?	郭檬楠,王文琪,杜亚光(5.68)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因果推断模型的经验证据	陈晓华,赵欣悦,吕 越(6.78)
人机协同能增强企业韧性吗?	罗栋梁,刘博雅,王 彦(6.90)

金融与会计

企业碳排放、碳信息披露与盈余操纵	桂良军,王暖欣(1.66)
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吗?	
——基于中国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彭承亮,阳叶兵,何启志(1.78)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审计调整	周楷唐,陶翔宇,周笑寒(2.67)
数字金融发展与年报预约披露延迟	周兆斌(2.77)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短贷长投:协同治理抑或合谋舞弊	吴 非,牛梦月(3.71)
控制权结构与企业金融化	陈 健,陈晓昱,贾 隽(3.83)
信用政策管控与央企盈余管理策略调整	
——基于央企压降应收账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吴秋生,王思童(4.80)
金融地理扩张与中国企业加成本率提升	
——基于银行分支机构网点空间分布的实证研究	宋凯艺,卞元超(4.90)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公司债券融资成本	吴春贤,朱生霞,张 静(5.79)
风险资本持股与企业短贷长投	范 润,翟淑萍,孙佳豪(5.90)

国民经济

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及演变趋势研究	刘灵辉,程 丹,冉琳源(1.89)
从污染化到清洁化:论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徐藜洋,张彩云(1.100)
绿色基金投资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来自公募基金签署 PRI 的引导与监督效应	王怀明,杨嘉琪(2.87)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如何赋能共同富裕	周科选,余林徽(2.100)
优化财政创新补助精准投入的路径研究	程 瑶,汤 宁,马亚妮,潘旭文(3.94)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研究	张 伟,汤 灿(3.103)
地方竞争下的人才资源配置与福利净损失	
——基于省际人才竞争的理论推断与测度	朱克朋,樊士德(4.102)
制造业集聚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	纪玉俊,宋 皓(5.100)
创新驱动与创业协同:平台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双路径机制	
.....	孙树奎,朱 忆,葛世龙(6.101)

纪检监察

监察赔偿的范围及程序构造	秦前红,陈芳瑾(6.54)
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的体系化构建	
——以结构主义为分析视角	郝 炜,汪自成(6.66)